

# 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引下的机制创新与路径前瞻

周伟

(中共新乡市委党校,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 基层强则国家强, 基层安则天下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本文客观剖析了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所面临的突出瓶颈: 权责失衡、机制僵化、能力短板等。基于此, 提出构建“政治势能-数字赋能-组织动能”三位一体的机制创新框架, 以“双向嵌入”制度创新实现权责协同、以智慧党建平台建设驱动流程再造、以培育“红色枢纽”激发多元共治, 从而实现党建引领的“有形覆盖”到“高效能治理”的深度转化。

**关键词:**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 二十届四中全会; 机制创新

**基金项目:** 2025年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项目编号 SKL-2025-113); 2025年新乡市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编号 B25220)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403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拥有着关键性的地位, 这一点毋庸置疑。随着全球化形势愈发复杂, 国内外环境剧烈变化, 社会治理要应对诸多严峻状况: 国外出现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 内部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 并且愈发错综复杂, 各种潜在的风险相互碰撞交织, 传统的管理办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 提升基层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与高效能水平, 已经变成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之一。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此作了前瞻布局 and 系统擘画: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这些论述既强调了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又明确了体系完善、功能拓展、技术赋能的推进实现路径。基层治理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 并且成效明显, 比如上世纪60年代就形成的“枫桥经验”, 但为什么要把党建引领放进来呢? 我理解,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并不是简单 $1+1=2$ 的关系, 而是要实现 $1+1>2$ 的效果。这也就意味着, 进行基层治理不仅要靠传统的治理方式, 还要把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相结合,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系统性地转化为基层治理的高效能。

当然, 理论和政策都是基于完美的假设,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转化却存在多种现实困扰。比如, 党建和治理存在两张皮现象, 党建引领如何真正嵌入治理现实确实不易; 在人工智能加速演进的今天, 党建优势怎样与新兴科技深度融合提升治理效能也费人思量……这些问题的涌现, 迫使我们在四中全会精神的引领下进行深入的学理剖析和实践探索。

正是基于以上现实考量, 本研究期望在剖析实践问题的前提下, 以四中全会的相关部署为引领, 探索切实有效的机制创新路径, 以期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认识、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一定程度的学术参考。

## 一、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大意义

### (一) 政治引领: 巩固执政根基与确保治理方向的根本保障

**作者简介:** 周伟(198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意义，在于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从根本上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首先，党建工作是国家政策在基层落地的重要抓手。按照四中全会精神，“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重点是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统筹协调作用。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层级架构保障了党的方针政策有效传导，变为群众自发行为，防止执行过程中信息流失或者理解偏差的情况发生。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任务部署的时候，地方党组织迅速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妥善应对各种挑战，从而做到了中央决策目标精准落地并达成了预期效果。

其次，党建引领是应对复杂局势、守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支柱。基层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风险大量聚集的关键区域，还是突发状况频发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场域，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及时反应、给出指导，展现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力--这正好吻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统筹发展与安全”战略要求，“党建+社会治理”的革新模式能够明显提高整体防控水平，为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坚实根基。

## （二）效能提升：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与低效化的核心路径

当前基层治理陷入“碎片化”发展困境，究其根本是多主体协同机制缺失、职能边界不清、信息流通不畅等诸多因素交织的结果，这种分散化的管理模式使得行政效率低下、响应速度迟缓、公共服务质量下滑，在此情形下，依靠党建引领形成系统性整合框架，已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重要路径之一。

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组织整合”与“利益协调”二者相互融合，在现有的行政治理体系当中，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政府经常会碰到职能界定不清，权力责任界限模糊，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状况。依靠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机制以及相关平台载体，比如共建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可以跨越地域限制，统筹协调区域内各方面的主体资源，围绕一些特定的公共事务，像社区环境治理或者养老服务体系的创建，进行协同共治的实践。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本质上就是通过强化街道党工委的“吹哨权”（统筹协调权），促使上级职能部门响应“哨声”、下沉资源，从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治理盲区问题。

此外，党建引领推动治理体系变革，由过去传统的“垂直管理”朝着现在的“网络化协同”方向转变，浙江省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实行“党建统领、网格智治”的措施，党支部或党小组进驻基础治理单元，党员担任网格负责人或者骨干，党的组织体系同社会治理平台相对接，并非直接叠加，而是涉及重塑信息流、业务流、责任链等，形成党组织统筹情况下，区域内人口、地理、事件动向、物质属性和组织架构等的数据库资源可高效收集、仔细分析和准确使用，凭借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途径促进群众诉求通道畅顺，实现政策落实和服务供给之间的双向互动提升，经考察，当处于党建网格全部覆盖的区域里，民生问题办结时效比没有覆盖的地方要短很多，平均接近30%以上。

## （三）民心凝聚：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实践载体

基层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四中全会重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恰恰是将这一思想落到实处的最直接、最生动的实践载体。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扎根群众实践，天然具有亲民属性和信任优势，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模式之下，“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成为核心理念，使得工作重心从传统的管理领域转型到现代服务范畴。“三会一课”制度、党员责任区划分以及主题党日活动等具体举措，让党组织能够精准地把握民众的需求并迅速回应诉求，在帮助弱势群体发展方面成果突出。以上海市为代表的地区创造性地形成居民区党组织统筹协调机制，整合驻区单位资源与在职干部力量开展志愿服务，成功推出“银龄伙伴计划”、“四点半课堂”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项目品牌，独居老人照料难题、双职工家庭子女课外辅导压力等问题得以缓解，这些“温情化”治理举措极大增强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同时，党建引领给基层民主协商和矛盾化解赋予了权威保障。在利益多元化，诉求多样的社区环境当中，经党组织带头创建“红色议事厅”或者“邻里调解室”，利用各种资源按照法律法规和社会伦理规则展开互动交流，往

往可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地解决问题并且达成共识的效果。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宣传党的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共精神的过程,有助于形成“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良好治理氛围,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和谐,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 二、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突出瓶颈

尽管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成效明显,不过向“高效能”转型时仍存一些深层次和结构性难题,仔细探究并精准把握这些瓶颈问题,成为推进制度革新所需的重要前提之一。

### (一) 权责失衡: 基层党组织的“责任无限”与“资源有限”困境

这是当前最为突出的矛盾。在“压力型体制”下,大量行政事务、考核任务通过“属地管理”原则层层下压至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乡镇(街道、村(社区)成为基层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实际承担多种职能的执行人,虽然他们要承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服务、安全监管等多项任务,但受制于人力物力资源和执法权限不足,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职能虚置现象,上级部门下发指令频繁但缺少相应授权和配套支持,政策落地效果大打折扣。

上述权责失衡的状况,引发基层党建工作陷入功能泛化,重心偏移的险境。有些党组织过度介入本该由行政机构操刀的日常事务性事务,陷入繁杂签章,冗长会议以及繁琐考核之类的形式主义困境。经由实证调查可得知,在某些区域社区当中,党员干部把超过六成时间花费在上级分派的文件处理和迎检任务上,而真正投入到群众联系服务,组织活动筹划以及长远规划上的时间却大为缩减,这种情形从本质上削减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量,价值塑造效果及其统筹协调职能。“党建引领”慢慢变成“包揽式”或者“替代型”的操作模式,其治理成效也就很难继续改进。

### (二) 机制僵化: 党建与治理“两张皮”与新兴领域覆盖不足

“党建引领”和“基层治理”的融合推进在实践中会遇到瓶颈,二者之间容易脱节,虽然“党建+”模式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但部分党组织在具体落实中存在形式化倾向,出现“三会一课”内容单一枯燥、“主题党日”活动表面化等形式主义问题。目前党建工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支持大多停留在表面,在重大事项决策、执行监督、效果评估等关键流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导致整体效能难以得到充分释放。

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架构及运作方式,还没有完全符合社会结构深刻的转型,出现了“覆盖面不够”和“功能减弱”的状况。城镇化推进步伐加快,商品房小区,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新式居住空间持续不断产生。平台经济兴起,造就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众多的流动就业人群,而且还带来了多种网络社交平台 and 虚拟社区,传统以单位或者户籍为依托的老式党建管理模式,在处理这些新兴领域群体时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 (三) 能力短板: 基层干部队伍的素养与数字赋能挑战

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最终要靠人来实现,尤其依赖于基层干部队伍(包括党务工作者和基层行政干部)的能力素养。当前,能力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法治化与专业化治理能力需提升。基层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关键主体,面对各种利益交织和矛盾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要求来进行处理,部分干部在运用法治理念解决复杂难题的时候会有局限性,倾向于用行政命令或者强制手段来解决问题。有时候因为程序方面存在缺陷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物业管控,环境监管,社区规划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事务当中,工作人员的知识体系和技术能力存在不足,难以很好地履行引领和推动的责任。

二是数字化转型中存在诸多现实障碍。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平台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平台向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方向发展”,各地也相继开发并推广智慧社区平台、政务移动终端应用,当前实践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部分老年群体数字操作能力不足,使“数字鸿沟”进一步加深。跨部门数据整合难度较大,造成部门间形成系统信息壁垒,即“数据孤岛”,阻碍大数据分析指导下党建指导策略的优化与实际成效的提升。“数字赋能”在基层治理领域处于摸索阶段,其潜力亟待进一步发掘,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尝试通过

大数据技术开展社会风险预警,通过智能化的方式简化服务流程,但是其整体的实践成果十分有限,且受到诸多限制,“数据驱动”的理念尚未完全融入日常工作体系,尤其在党群关系线上互动方面更加明显,社区工作者对新出现的各种信息技术的实际操作水平普遍较低,数据分析工具的应用能力也比较有限,仅有少数地区比例超过20%。

### 三、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机制创新

要冲破现有的发展瓶颈,就要依照四中全会精神,展开全方位,系统性的体制机制革新,关键是要推动党建引领模式从“物理叠加”向“化学反应”这一深层次转变,并创建起“政治势能—数字赋能—组织动能”这三个要素协同的治理体系,以此达成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 (一) 制度创新:构建“双向嵌入”的权责协同与资源下沉机制

解决权力和责任失衡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上促进党的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实现“双向嵌入”和深度融合,治理资源向基层实体性转移。

首先,深化“党建引领下的治理共同体”制度建构。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的推广和完善,不是简单地多几个兼职委员,而是要赋予其实质性的议事协调权和资源调配建议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街道辖区内的重大事项、重大工程、重大矛盾进行共议共商,决议后由各成员单位(政府部门派出机构、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根据职责落实,党组织进行跟踪督办。党组织由行政事务的“执行末端”变为区域治理的“协调中枢”。

其次,建立“清单化”权责划分模式,建立“赋能型”资源倾斜机制。上级党委和政府应共同制定并不断调整完善《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清单》,明确基层组织的责任、辅助性事务以及上收的行政职能,从根本上减轻基层负担。在权力下放或责任转移时,要同时配套相关资源投入(如财政支持、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同时给予基层一定的统筹协调权和相关绩效评估参与权利,使政策实施效果得到质的提升。例如,成都等地探索的“社区保障资金”制度,由区级财政直接向社区拨付一定额度的资金,社区党组织牵头,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决定资金使用项目,有效增强了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 (二) 工具创新:建设智慧党建平台驱动治理流程再造

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驱动力,党建工作数字化转型已成必然,“智慧党建+基层治理”一体化平台随之应运而生,并要围绕“集约化、智能化”目标展开设计与优化,“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智能分析决策”是该平台的核心功能定位与发展重心,“流程再造”实现整体提升也成为打造高效能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

一是应该重视跨部门协同的数据整合,依靠党员信息系统,政务服务网络平台以及综治网格管理模块等多种数据资源,在保证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形成基层治理主题数据库。这给党组织全方位把握区域发展情况,精准判断潜在风险并制定精准服务方案赋予了可靠依据。

二是要开发贴合基层实际的应用场景。例如,开发“党员线上报到与任务认领”模块,引导在职党员根据自身特长在居住地社区参与治理服务;开发“民情直通车”模块,群众可通过APP随手拍、随时报,信息直达网格党员和社区党组织,并形成“上报—分流—处置—反馈—评价”的闭环管理;开发“重点人群智能关爱”模块,通过物联网设备(如智能水表、门磁)与数据分析,对独居老人等群体实现异常情况自动预警、党员志愿者及时上门。

上海市搭建的“一网统管”市域治理平台,渐渐做到了同党建系统的数据互通有无,管理者经由这个系统,可以即时得到网格区域之内党员的分布情况,活动轨迹(在保障隐私安全的前提下,以及各自承担的任务,并且在遇到突发状况或者难处理的事务的时候,迅速调集附近区域的党员人员前往现场开展工作,这种党建带动下的应急管理体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急结合”的高效运作模式增强了基层的治理效果。

#### (三) 主体创新:培育“红色枢纽”型组织与激发党员先锋动能

高效的治理需要充满活力的多元主体。党建引领的作用在于孵化、引领和整合各类治理主体,形成“一核多元、协同共治”的生动局面。

一方面,要着力培育形成以“红色枢纽”为特点的社会组织体系与自治平台。基层党组织不可过多涉及具体事

务,主要扶持,引领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公司的规范化发展。在这些组织内部植入党建要素,经由在符合条件的业委会中设置党务工作组,推荐优秀党员参与竞聘,社区党委带头组建公益服务型或者功能性社团,诸如养老互助社,创建兼具服务功能与精神引领作用的“红色阵地”。对于快递物流、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可通过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设立“小哥驿站”并嵌入党建服务功能等方式,将其逐步纳入基层治理网络,使之成为社区治理的“流动哨兵”和“前哨探头”。

另一方面,要想激活党员主体功能,就要打造“内生先锋动力”的革新机制。打破传统岗位职责和承诺践诺的老套模式,就得探寻更具针对性的激发途径。基层治理可以把“积分制”这样的管理方法作为关键手段,把党员在社区的服务贡献变成具体数值,并纳入绩效评定体系予以考量。对于复杂的治理问题,则可以成立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专门小组或者智囊团,经由数字化平台发布定制任务清单,微心愿项目等,促使党员主动去对接群众需求,保证其先进性在基层实际中得到充分发挥并不断改善。

#### 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前景展望

基于新时代发展脉络,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正朝着系统化深化和效能提升的新阶段迈进。

##### (一) 治理范式转型:从“管理主导”到“价值引领与制度整合并重”

未来党建工作的发展动向将会逐步走出传统微观事务管理的层面,重点在于“元治理”职能的有效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的任务是做基层社会的“治理体系设计者”和“规则秩序守护者”,并且会采用“塑造价值共识”、“完善制度体系”、“规范主体行为”和“维持公平正义”等方式达成目标。其特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价值引领,塑造基层公共精神。党组织将更加注重通过宣传教育、文化熏陶、榜样示范等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契约精神、责任意识和共同体观念,为基层治理凝聚最深层的价值共识,化解因价值观差异导致的治理冲突。

二是深化制度整合,形成系统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机制,公众参与途径,监督网络等关键因素以推动党建工作程式化,流程化发展。并为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健全而明确的支撑,以契合四中全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目标。

##### (二) 技术深度融合:智慧党建驱动治理形态系统性重塑

数字技术将与党建引领产生更深层次的“化学反应”,驱动基层治理形态发生系统性重塑。

一是预测性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上大数据分析手段,智慧党建平台能够做到对社会舆情动态,潜在风险因素以及安全隐患的即时监测,并且给予精确的预报警告,促使治理体系从传统的被动应付模式转变为主动预防和预先控制,基层党组织就能事先安排防控举措,在问题刚冒头的时候就实施干预并妥善处理。

二是治理场景无限延展与虚实融合。党组织自我工作的领域性边界不再局限于原先简单物理定义,逐渐向网上平台、社交媒体等领土渗透延展,并尝试用“数字化双生社区”技术仿真模拟分析基层社区实际运作状况以及相关政策执行结果等“线下效果”,为下游决策制定提供数据参考与改进思路。

三是个性化与精准化服务成为常态。通过对居民需求数据的有效挖掘分析,基层党组织整合各类资源,推出针对性更强的各类服务方案和相关民生保障措施。服务模式逐步从单向供给向双向互动转变,通过智能化手段提高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使群众的满意度和社会治理效能大幅度上升。

##### (三) 全球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贡献基层智慧

中国在党建引领下探索的基层高效能治理实践,正在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治理知识体系和实践方案,其全球意义日益凸显。

在全球治理危机频发的社会矛盾、公共服务能力衰退背景下,中国模式却蕴含着独特的“整合-共识”创新范式,它凭借坚强政治领导力,很好凝聚分散资源,协调多元利益诉求,制订系统化区域发展(战略)部署计划,维持社会稳定并促使其可持续发展。“共建共治共享”以党的建设为核心理念,为破解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中的“集体行

动困境”，构建起十分具有本土化特色且富含价值的典范经验。

讲好中国基层治理的故事，阐释好“党建引领”背后的制度逻辑、文化基因和实践效能，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话语垄断，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责任，更是增强“四个自信”，特别是“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 (2025-10-23)[2025-12-31].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386/202511/content\\_7047415.html](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386/202511/content_7047415.html).
- [2] 翟文康,惠长虹. 功能型平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逻辑机理与创新路径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5, 41 (08): 108-118.
- [3] 佟亚洲. 数字智能驱动基层治理的三重悖论及其调适 [J]. 中州学刊, 2025, (08): 73-82.
- [4] 刘开君. 公众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趋势、实践困境与策略优化[J].南京社会科学,2025,(12):83-93.
- [5] 苏长好,刘颖艳.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与出路——评《基层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J].管理世界,2025,41(12):227.
- [6] 李娜. “三化联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J].党建,2025,(12):57-58.
- [7] 陈立中.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果评价——基于 C 市的个案研究[J/OL].湖南社会科学,2025,(06):114-123.
- [8] 张龙,张新文. 统合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与运作机制——基于川西 Z 村的个案观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06):88-99.
- [9] 曾盛聪,董沁昕. 激活“新”力量：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组织化的机制与路径[J].探索,2025,(06):74-88.
- [10] 毛一敬,刘建平. 党建引领村民自治的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研究——基于河南省新密市 S 村的调查[J].求实,2025,(06):15-25+107-108.
- [11] 程奎.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出场逻辑、功能任务、实践路径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5, (07): 21-27.
- [12] 张婷,崔史歌.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J].改革,2025,(10):42-55.
- [13] 高立伟. 党建引领“三新”群体参与基层韧性治理的协同机制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18):38-49.
- [14] 赵淑梅,陈问天.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挑战与路径[J].治理研究,2025,41(05):88-100+159.
- [15] 文宏,梁家婧.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何以共创公共价值? [J].行政论坛,2025,32(06):158-170.

## Party Building as the Guide for High-Efficiency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Future Path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Zhou wei

*Party School of Xinxiang Municipal Committee, Xinxiang, China*

**Abstract:** A strong grassroots foundation ensures a strong nation, and stabilit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nsur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tate; grassroots governance serves as the cornerston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ce again emphasized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rough Party building. This paper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prominent bottlenecks currently faced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led by Party building, namely, imbalances i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rigid mechanisms, and capability deficienc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tripartite mechanism innovation framework of "political momentum,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vitality."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wo-way embedding" to achieve power-responsibility synergy, the construction of a smart Party building platform to drive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ed hubs" to stimulate diverse participation in co-governance. Consequently, this facilitate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angible coverage" of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to "high-efficiency governance."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guidan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Mechanism Innovation